

史学理论与方法

李清凌 著

史学



序

瞿林东

李清凌副教授撰写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一书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使我感到十分高兴的事情！清凌同志嘱我为此书写篇序文，我是推辞不了的。

1983年，白寿彝教授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办了第一期史学概论进修班。我因参与了《史学概论》的撰写，所以也是这个进修班的主讲教师之一，清凌同志参加了进修班的学习，我们的相识已经十年多了。进修班结业后，清凌同志回到西北，在很短的时间里，他编了一本史学概论教学参考资料，并长期讲授史学概论课程，他对史学理论的教學和研究，是很执著的，即使在担任行政职务的情况下，也没有丝毫的懈怠。《史学理论与方法》一书，正是他在这方面长期努力的结果。

八十年代以来，在我国史学界和大学历史系，关于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史学概论课程的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推动了史学概论课程建设的发展；史学概论教学中不断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又促进了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最近十几年出版的一二十本史学概论或史学理论方面的教材、专著，作者大多出于高等学校，这是很自然的。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历史学界和高校历史系的研究工作者与教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理论研究的热情正在高涨，整体理论水平正在不断提高。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步入新的历史时期

后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史学理论究竟应该讲哪些问题,或者应该研究哪些主要问题?史学概论这门课程究竟应该讲授哪些问题,这门课程的教材应该怎么写才更合适?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已经得到很多收获。虽然在教学中和研究中还有一些不尽相同的认识和做法,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在深入,在提高。清凌同志的这部书,正是他在吸收了近年来这方面的一些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在教学中研究所得而撰写出来的。这书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作者在全书的结构上注意到把史学跟历史既区别开来又结合起来。我以为作者在这方面的思考和处理是有创见的。这具体表现在:作者把有关史学的一部分问题概括为“史学论”提出来,这是很有启发性的做法。如果我们讲史学理论或史学概论,连历史学本身究竟是什么也没有讲清楚,那就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了。本书把“史学”作为专编来论,或可避免这种缺陷。此其一。其二,作者以“史学论”开篇,其次讲到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最后又回到史学方面的问题即史学方法论,这是一个从史学入手讲到历史本身和认识历史的有关理论问题,而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收篇。这样一个逻辑体系正是围绕着“历史学”而展开的,比较恰当地反映出了史学理论或史学概论所涵盖的主要问题。仅就这一个特点来看,本书是有它成功的地方的。在科学工作上要取得一点成功是很不容易的。我衷心的向作者表示祝贺!

十年前,和清凌同志一道在史学概论进修班学习的青年朋友,在学术上都有很大发展,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藉此机会,我也衷心地向他表示祝贺!

1993年12月4日序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

后 记

本书是我向学生讲授史学理论课程中陆续写成的。十年前，我有幸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办的“史学概论讲习班”，聆听了白寿彝、刘家和、瞿林东等先生的精彩讲演和议论。1990年8月，我又参加了国家教委西北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培训中心主办的“暑期史学概论教师讲习班”，再次听到了瞿林东、蒋大椿、赵吉惠、桂遵义等先生的宏论高见。回校后，悉心研读有关书籍、报刊，探索史学概论（或史学理论）课的宗旨和内容，所读史学理论主要书籍不下40余种，从前辈著作中汲取了很多的学术营养。我逐年将自己所得所想写成文稿，反复修改，积年遂成系统。教材中很多观点并非我的创见，却都是经过采撷、被我吸收消化了的。因此，本书可以看作是我向前辈时贤学习的心得和结果。若有不妥之处，当然应由我执其咎。

本书编写过程中，还得到西北师大金宝祥教授、郭厚安教授、马英昌教授、陈自仁副教授等同志的指点或校阅。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瞿林东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常委、前省教委主任王松山同志题写了书名，甘肃民族出版社赵兰泉总编辑、西北师大敦煌研究所刘进宝副研究员为本书的出版给予很大的帮助和方便。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作者学识浅薄，此书问题必定不少，尚祈读者不吝赐教。

著 者

1993年11月20日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编 史 学 论

第一节 历史学的产生、发展和科学化	(9)
第二节 历史学的社会功用	(21)
第三节 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30)
第四节 历史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	(40)

第二编 历史本体论

第一节 人类历史活动的组织形式	(52)
第二节 社会历史过程的规律	(62)
第三节 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70)
第四节 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动力及发展方向	(85)

第三编 历史认识论

第一节 历史认识的主体	(95)
第二节 历史认识客体的特点和一般内容	(106)
第三节 历史认识的中介	(117)
第四节 历史认识的结构过程及真理性检验	(128)

第四编 历史学方法(上)

第一节 阶级分析的方法	(140)
第二节 逻辑的方法	(147)

第三节	历史的方法及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之统一.....	(156)
第四节	比较的方法.....	(166)
第五节	系统的方法.....	(180)
第六节	计量学的方法.....	(190)
第七节	心理学的方法.....	(198)

第五编 历史学方法(下)

第一节	史书的体裁.....	(209)
第二节	史书的类例.....	(217)
第三节	史书的语言与表述技巧.....	(225)
第四节	史学评论的方法.....	(234)

第六编 余 论

第一节	谈谈历史学的学习方法.....	(250)
第二节	怎样写史学论文.....	(263)
第三节	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及成才道路.....	(270)

绪 论

一、《史学理论与方法》课的历史、现状和学科特点

“史学理论与方法”又叫“史学概论”，它是一门从理论上概括介绍历史学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引导学生用正确方法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课程。从理论的高度来研究史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古代史学家，从司马迁、班固、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马端临到清代的章学诚等人，在其史学实践中都形成了许多卓越的看法，例如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索历史本源和规律的思想，《通鉴》倡导的史学“资治”的目标，刘知几、章学诚提出的史法、史义，以及各史创立的表述形式等理论、见解和模式，直到今天还是熠熠生辉，值得总结、借鉴的。本世纪初，桐城姚仲实从方法论角度写了一部《史学研究法》，全书包括史原、史义、史法、史文、史料、史评、史翼、结论八个部分，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史学理论的力作。二十年代，梁启超写的《历史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续编》，代表了我国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也是在二十年代产生的。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大钊写的《史学要论》一书，讲述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学，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相关学问的关系，以及现代史学的研究对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问题，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著作。三十年代后，我国陆续出版的史学理论著作不下数十种，大致都偏重于阐释概念，划分学科领域或讲述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探讨史学的任务、内容和体系的论著并不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史学和其它学科领域一样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史学理论著作不断地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赵吉惠的《历史学概论》,田昌五、居建文编的《历史学概论》,还有新近出版的杜经国、庞卓恒、陈高华著的《历史学概论》等等。由于史学理论至今还是一门新学科,四十年代以前的旧作大都不孚众望,而新作的又刚刚开始流行,加之史学评论工作赶不上,因此,要推出一部为大家公认的、较有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还需要史学工作者的继续合作和努力,对一些决定学科方向、知识范围和体系的纲领性论题,如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对象、任务和内容等问题,史学理论界分歧很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对于其它较深层次的认识,就更需要通过深入细致的讨论,才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

历史学是一个包罗宏富的学科,对于这样的一门学课,人们可以从“史”的角度研究它,如史学史;也可以从“观”的角度研究它,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哲学;还可以从方法的角度研究它,如历史研究法等等。“史学理论与方法”概括了以上诸多方面,而突出一个“论”字。然而就以“论”而言,很多同志对它的解释也是不尽相同。如有的同志主张史学理论与方法或概论的研究对象应是指“三基”教学,即史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吴泽),有的同志主张“论”应针对史学在其发展中所涉及和面临的重要问题(白寿彝);还有同志主张这个“论”应指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赵吉惠)等等。不过统观各家著述,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论在内容上有何差别,而在指导思想,都力图确定史学理论或概论所要解决的一个特殊矛盾,将它与相关的学科区别开来,使其真正变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我们认为《史学理论与方法》课应该采取“论”的形式,概括介绍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启发和引导学生跨入历史科学研究的

门槛。在这里,史学理论或概论的“论”,当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照搬和复述。有一种观点主张“史学理论与方法”应有独立的理论体系,但在讲到具体任务时,又主要是说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对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史学理论课程无疑应当介绍,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不突出史学理论课程的学科特点,只是一般地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那怎样将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课分开呢?不错,史学理论课程的理论体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穿唯物史观的精神,然而在这个前提下,还应该讲出史学理论课程的特点,而不是简单地重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否则,就难免在教学上与历史唯物主义雷同了。

史学理论或概论与史学史等课程都是围绕史学展开的,但它们的认识角度、侧重点和知识范围各不相同。史学史旨在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史学在各时代的代表人物、作品及其特点,史学内容的变化跟社会条件的关系,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等,为我们当前的史学工作提供借鉴。它侧重于史学的纵向研究,是文化思想史的一个特殊范畴;史学理论与方法则要从史学的结构、功能和方法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提炼,升华到具体理论,为学生从事历史研究提供知识、理论和方法,是理论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见,史学理论与方法是有其特殊研究对象的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史学史等有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

二、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学科任务

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课程教学任务,国家教委尚未制定出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就是说,对于这门课程的学科任务,目前还处于探索和总结经验阶段。我们认为,本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主要应向学生概括地介绍史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帮助他们提高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志趣和能力。

这里说的基本理论,重点不是某一历史领域、历史过程的具体理论问题,而是属于较高层次的,作为整体历史过程和整体史学的学科理论,如历史学发生、发展和科学化,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学科地位、纵横关系的理论,社会历史过程的性质、规律、动力、趋向的理论以及认识论、方法论等问题。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史学基础理论和具体的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看作一般、特殊和具体三个不同层次的理论,那么,我们这里说的基础理论就是上述理论中属于中间一个层次的历史学特殊理论。

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知识,重点不同于大学历史系所开其它公共课、基础课和选修课,如政治、通史、历史文选及各门专史、断代史。后者只探索各类具体历史的特殊过程和规律;史学理论则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探索史学的总体性知识,如史学的研究对象、特点、任务、作用、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过程和方法等,从而将各门具体学科的知识有机地联结起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整体地教给学生,引导学生将所学各门课程的具体知识概括、抽象和升华,促使专业知识转化为智能,从而提高思维、研究和工作的能力。

本课程在基本方法方面的教学任务,应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能力。包括思维的正确形式、认识方法、表达方法、编纂方法、评论方法等,这些方法在其它课程中并无系统的论述,而“史学理论与方法”课程则应当给予全面的介绍,从而为学生检查弥补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知识量树立一个参照系,提高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科学性,减少盲目性。

对于“史学理论与方法”课的教学任务,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有些著作虽然提到了“理论”课要在科研上给学生以启迪的任务,但份量仍嫌不够,容易在实际教学中导致空泛虚浮的后果;二是有些著作忽略了“理论”知识的理论性、概括性特点,他们虽然提出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引导学生跨入科研领域的教学任务,可是,如果“理论”知识不与各门具体学科、具体业务知识相联系,那么学

生即使掌握了认识论、方法论,还是无法成功地进行科学研究。如所周知,科学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能力运用,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掌握一般的基础理论知识,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了解如何科学地研究它,而且还要熟悉所研究的具体学科领域,掌握信息,有一定的材料积累和文字表达能力。这些都要靠其它学科的配合和平时多学多练,仅靠“理论”课程是不够的。所以,“史学理论与方法”课在给予学生一定整体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的同时,还必须强调各门具体学科的学习和从多方面提高科研素质,理论联系实际,在“练”字上下功夫。

三、史学理论与方法课的内容和体系

为了实现“史学理论”课程的上述教学任务,应当如何安排“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学科体系呢?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大同小异。如有的学者为本学科确定的内容是:①说明什么是历史学,包括历史学的对象、任务、特征、作用及对史学工作者的要求等;②论述历史科学的认识特色、研究方法,主要回答怎样对客观历史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③解释历史编纂的一般原则,说明如何以恰当的形式反映历史研究的成果,达到历史研究的社会目的。有的学者则认为史学概论(理论)的知识体系应包括五个方面: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体裁和体例、历史文学及史学跟其它学科的关系。还有一些论著尽管其框架结构稍异、读者对象、文字浅深或部分观点有别,但论述的基本范围和内容则大致相仿。统观近几年国内出版的几种同类著作,有以下几个值得商榷之处:

(一)研究对象狭窄。有同志主张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史学本身的理论,因而在编写课时时将客观历史的一般性理论排除在外,或者在讲到史学本身理论时稍稍涉及。有的课本虽然另辟专章,讲述有关历史本体论的内容,但由于他们从理论体系上将史学

本身的理论与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割裂开来,因而不免显得支离琐碎,缺乏整体感。还有的教材以讲历史学理论来标目,而实际只讲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很少涉及史学本身的理论,结果走到另一种片面去了。再从教学实际来看,大学历史系各门课程如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内容多而教学时数少,不可能系统地讲述一般性理论问题,本科涉及史学理论的课程,高校历史系一般只开一门,所以史学理论或概论课稍一疏忽,这部分知识就变成了教学中的缺环。反过来,只讲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而忽视史学本身的理论,效果同样不佳。

事实上,史学本身的理论与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是相互渗透、难以分开的。说到底,史学本身的理论还是客观历史过程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史学研究及其成果本身就是人类客观历史过程的一个方面和积淀,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应该包括史学研究及其成果的理论;反过来,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也应该是史学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无非是史学工作者认识客体历史的结果,作为理论形态,仍属于史学本身理论的范围。至少是史学“本身”理论中主体理论重要的内容,试问离开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怎样讲史家主体的研究对象、怎样讲世界观呢?难道存在离开研究对象理论的史学理论“本身”吗?所以,在讲述形式上,我们可以将史学本身的理论与客观历史的理论当作史学理论的两个方面,而在学科结构上,又必须将二者看作统一的理论体系,不宜分道扬镳,搞得过于狭窄。在这方面,“理论”或“概论”课有必要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二)部分内容与相关课程重复。历史专业各门课程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又各自分担着不同的教学任务,不应该重复或雷同。晚近所出的一些“理论”、或“概论”教材与其它相关课程就有许多重复的地方。如中外史学史各大学历史系基本都开设了,它对中外史学发展的过程、主要史家和史著以及史学发

展的规律等已经有了系统的介绍,“理论”课实无必要再有大量的章节来叙述“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的历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或“中国和欧美史学史”。如果是出于周密地安排“理论”课程逻辑体系的考虑,则这部分内容只需在较高层次上作理论性的概述,无须作详尽的论列,否则,势必影响课程分工的科学性。再如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形成具有历史学学科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或曰历史哲学,这应是“史学理论”课讲述的一个主要内容,有些教材编者在讲这方面内容时,忽视了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的学科理论层次,用“历史唯物主义”取代了史学理论,这样,一则使学生将史学理论误解为历史唯物主义,二则造成了“史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内容的重复,类似情况还有一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三)应用性不够。学习一门课程为着增加一个方面的知识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史学理论的教学目的,就是通过对史学基本理论、知识、方法的介绍,帮助学生了解和学会历史研究,进而提高思考问题和实际工作能力。在这方面,它与“历史研究法”的教学目的有相通之处,在没有开设“历史研究法”课程的情况下,“理论”教学更应该向这方面倾斜,然而我们看到,有些教材对这一问题注意不够,有些虽然注意了,但所讲方法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如何恰当应用各种方法的问题,涉及就更少了。比如,限于教学性质,本门课程只能从理论上讲一些历史研究的常识,而要将这部分知识转化为学生的实际本领,就应强调两个“结合”:一是如上所述理论方法要与各门专史、通史以及课程的内容相结合;二是要把“理论”课程内容的学习与实际的研究工作相结合,做到从“理论”课中学方法,在其它专业课程中选题目和找资料,边学习边研究,理论结合实际,引导学生真正掌握课程内容和研究方法。在这方面,“理论”教材编写中仍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鉴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已经出版各种史学理论与方法或概论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

究改进,提高本门课程的教学水平。我们不揣简陋,提出自己对本门课程内容的构想:以史学整体性问题开其头,继之以历史本体论、认识论和中西主要方法的介绍,总为四大块六编,一以备教学之用,二以向学术界请教。

总之,解放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广大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大学史学理论与方法或“概论”课程从无到有,乃至普遍开设,无论在教材建设还是教学水平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我们所见已经出版的许多教材都有不少独到的长处,本文所讲一些吹毛求疵的话,只是从教材建设的更高希望出发的,一孔之见未必完全正确,不当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思考题

试述“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对象、任务和内容

第一编 史 学 论

第一节 历史学的产生、发展和科学化

一、历史学的产生和发展

历史学是在一定观点指导下,通过史料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的产生是非常古老的。早在人类社会刚刚形成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回忆、总结和探讨自己的往事,并把它讲述给下一代。这些讲述往往夹杂着想象虚幻的成分,然而它又孕育着人类社会早期的史学。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记载的印第安人用各种颜色的贝珠编成有图案的带子,然后把某些特殊的事情同某串贝珠或某一图案联系起来,帮助记忆、传授自己的历史。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有的直到解放初还不会使用文字,他们采用木棍记事,发生了大事,刻一长划,发生了小事,刻一短划,循着这些长长短短的刻痕,即可讲出一部生动的历史。还有我国古书中关于“结绳记事”、“刻木记事”的记载,都是文字出现以前,史学的雏形。当然,象这样形式简单,内容局限于记忆事实本身的史学,还谈不上总结历史经验,探讨历史规律的问题。这是史学的萌芽阶段。

文字产生以后,严格意义的历史学才由原始、质朴的形式发展起来。据考证,“史”字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确切地指史官了。“史”字篆文作,许慎《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中正,段玉裁释为“君举必书,良史书法不隐”。又,即为右手之义。吴大澄《说文古籀补》云:“史,记事者也,象手执简形”。古文“中”作,无作中者,推其意,盖以中当作,即之省形,册为简策本字,持中即执简册之象也。王国维解释说:中为古盛算之器,

“匚”作盘形，“丨”象柄，古时算与简策本同物，故盛算之中，亦用以盛简，故史字本意，指手持盛算之器记事之人。这些解释大同小异，都将史字解释为手持簿册，执掌记事的史官。见于文献记载的史官，最早的是我国殷代的“贞人”。周代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御史。当时从王国到诸侯国、卿大夫之家，都有史官。“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说明他们还有一定分工。记录历史是当时的大事，史籍由此也丰富起来了。《春秋》、《左传》等典籍，就是我国早期史学的传世作。《汲冢书》【因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魏襄王墓冢中发现，故名，又称《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所修的通史，记夏商周三代史事。周宣王后仅记晋事，晋亡后仅记魏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止。战国时的国别史有《国语》、《战国策》。从六经皆史的观点看来，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诸子书，包括被孔子删修过和后来被当作儒家经典著作的《尚书》、《易经》、《诗经》、《周礼》、《论语》、《孟子》等，都是我国早期的史学著作。

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历史学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史记》、《汉书》两部划时代史学巨著的问世，奠定了历代正史的模式，这两部书不仅开创了纪传体通史、断代史体裁，而且启发史家在史书表述形式上不断地探索创新，教给人们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史记》穷经竭史，注重调查的踏实学风，“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的“直书”笔法，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史论结合形式和生动、活泼、凝练的文字风格，尤其是它打破朝廷政治之藩篱，拓展史学研究的领域，不仅写朝廷史，而且写民众史、甚至写人民起义史；不仅写政治史，而且写文化史、经济史、民族史；不仅写一般历史事实，而且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索历史发展的内在因果联系的开拓精神，更是值得肯定的。它从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层次等方面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史学；我国封建社会的史学由此踏上了迅速发展的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地主阶级为了标榜其门阀地望，十分重视修史，魏明帝太和(227—233年)中，国家设置了专职史官“著作郎”，隶中书省【《晋书·职官志》】，私家著史亦甚风行，史学著作的数量一时大增。汉代刘歆编写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都没有从分类学上把史书单列出来，唐人作《隋书·经籍志》时，当时史书存亡合计已有867种，16558卷之多，故不得不将“史部”单列，成为古代四部书籍之一。《隋志》史部书大多作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见当时著史风气之盛。在史书体例上也有不少创新，如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北齐魏收的《魏书·释老志》，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等，在传记、方志、史注等方面都有所创建，扩大了志书记载的范围。

唐宋时期，我国史学进一步发展，突出表现在史馆的设置和史书体裁之增加。还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朝政府出于强化中央集权之目的，下令严禁私家撰史，同时，设史馆撰修本朝和前朝历史。唐太宗继承这一作法，于贞观三年(629年)设史馆，由宰相监修国史。此后，历代史馆制度相沿不衰，后朝为前朝修史，形成传统作法。史馆制度改变了唐朝以前私人撰修国史的旧习惯，从此，国史“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对于这一做法，唐刘知几以来非议者很多，如刘知几说它“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又云：“史官记注，取察监修，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史通·忤时篇》】。梁启超说：“官撰、合撰之史，其最大流弊，则在著者无责任心”【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其实这种批评并非公允，一则唐以来，官修史书佳作不少，如《晋书》、两《唐书》、《明史》等，为历代史家所称道。二则唐以前许多史学名著，也不是成于一人之手，而有很多不署名者玉其成。三则官修史书有政府作人力、物力之保证，集体写史，集思广益，凝诸家之长于一书，有利于缩短编纂时间，提高史书质量，因而是一种较好的编史形式。直到今天，